

壽勉成著

社會的經濟基礎

上海世界書局印

社會學叢書
第四種

主編者

美國紐約大學社會學博士
國立中央大學社會學教授

孫本文

美國華盛頓大學碩士
安徽大學教授
壽勉成著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再版

社會的經濟基礎 (全一册)

【每部定價銀六角】

外埠酌加郵費匯費

著者 壽 勉 成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印刷者 世界書局

發行所 上海各省 世界書局

社會學叢書序

社會學是晚近發展的一種極重要的科學，大概已爲世界學者所公認。他的重要，可從三方面來說明：

(一)從科學地位方面說 社會學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本科學；他是研究社會科學中共通的原理原則；所以研究任何社會科學的人，不能不首先研究社會學。

(二)從個人生活方面說 社會學是研究人類社會行爲的科學；他的供給人類如何適應社會環境的知識。因爲任何人不能不適應于社會環境，所以任何人不能不明白社會學。

(三)從社會改進方面說 社會學是研究人類共同生活的原理原則；他是告訴人類，如何可以興利除弊，如何可以增進幸福；所以謀社會改進的人，不能不首先瞭解社會學。

社會學既然是這樣重要，所以近年來歐美各國，研究實驗，不遺餘力；學者既多，出版物自日見增加。返視我國，則研究社會學的興趣，尚不如歐美之濃厚，所以對於社會學的理论和實際，猶少有系統的介紹；有志學者，雖欲一窺堂奧，而輒無從取材；結果，往往借徑于西籍，這當然不是長久之計。

以中國目前社會科學的幼稚，和社會建設的急切而言，正需要一種有系統的社會學書籍，供給一切關於社會行爲的知識，以備研究社會科學者和策劃社會建設者，以及一般人研究參考之用。

本叢書的編輯，或者正可以供給我國目前這種急切的需要。叢書內容，務求切實；學理應用，雙方兼顧。各書陳述，雖不必有獨創之見；但執筆者均係國內專攻社會科學之人，對於所任各書，尤擅專長，差堪自信。希望叢書之出，足爲我國社會學發展的導線，和今後社會建設的指針，方始不負本叢書編輯的一點微意。

例言

一、社會的經濟基礎，僅社會基礎之一部。其他基礎尙多。故與唯物史觀的主張不同。讀者幸勿誤會！

二、本題範圍極廣，材料甚富，祇以限於時間，未能詳盡，尙望讀者原諒！

三、本書雖由孫本文教授主編，但遺漏謬誤之處，仍當由著者負責。

四、本書引用他人言論之時，均有附註，以明來處。

五、本書起稿於復旦大學，而脫稿於安徽大學。一遷移間，而時間之損失不小。遂致繳卷過遲，這是我應該對孫教授和世界書局道歉的！

十八，四，一，壽勉成於安徽大學。

目次

第一章	緒論	一
第二章	經濟現象的分析	四
第三章	社會現象的分析	一一
第四章	社會本體的經濟基礎	一二
第五章	社會組織的經濟基礎	一七
第六章	社會精神的經濟基礎	二五
第七章	社會衝突的經濟基礎	五六
第八章	社會革命的經濟基礎	五九
第九章	新經濟與新社會	六八
第十章	結論	七五

社會的經濟基礎

第一章 緒論

社會的經濟基礎，並非說除了經濟以外，社會就沒有其他的基礎也。人類之氣質與智識二者，不皆與社會有根本的關係，而不容忽視者乎？抑社會的經濟基礎，亦並非否認經濟現象之爲社會現象的部份，不過就社會現象之經濟部份與其非經濟部份之根本關係，作一分析而已。

社會之有其經濟的基礎，先哲已屢言之。孔子不云乎？「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」又曰：「富之教之。」孟子亦曰：「民事不可緩也。……民之爲道也，有恆產者有恆心，無恆產者無恆心，苟無恆心，放辟邪侈，無不爲已。」又曰：「無恆產而有恆心者，惟士爲能。若民，則無恆產，因無恆心；苟無恆心，放辟邪侈，無不爲

已。……是故明君制民之產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飽，凶年免於死亡，然後驅而之善，故民之從之也，輕。」又曰：「不遠農時，穀不可勝食也。數罟不入洿池，魚鼈不可勝食也。斧斤以時入山林，材木不可勝用也。穀與魚鼈不可勝食，材木不可勝用，是使民養生送死無憾也。養生送死無憾，王道之始也。」又荀子尚有禮教起於欲望之說。其言曰：「人生而有欲，欲而不得，則不能無求，求而無度量分界，則不能不爭，爭則亂，亂則窮。先王惡其亂也，故制禮義以分之，以養人之欲，給人之求。使欲必不窮乎物，物必不屈於欲。兩者相持而長，是禮之所起也。」（見禮論）

西哲中之有鑒於此者，亦頗不乏人。亞力斯多德早就說過：「人類騷擾的原因，不在名利之營求，即在名利之喪失。一國國民的革命，亦每為雪恥辱抗罰金而起。」柏拉圖亦謂：「貧富與人類之心理及行爲，大有關係。」十七世紀英國之詹姆士哈林登則謂：「一國政治的組織，每依財產之分配為轉移。」最近復有馬克思的唯

物史觀及其信徒之闡述，以爲社會的一切文化，全由生產的方式命定。凡此，皆關於社會的經濟基礎之言論也。

雖然，固皆知關係之存在矣，惜多認爲片面而非交互。以爲惟經濟能移轉社會，而社會不能移轉經濟。方法既已錯誤，又何怪結論之不能自圓乎？而且社會學負有促進社會文化之責任，不僅是一個描摹社會現象的科學。故除分析舊經濟與舊社會之關係以外，尤貴有新經濟以新社會之建議。這是很重要的。現在的社會科學，犯了一種很大的弊病，這就是分別得過於細碎。經濟學爲經濟學，倫理學爲倫理學，政治學爲政治學，彷彿沒有什麼密切關係的樣子。其實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，是分不了的。從前亞力斯多德的政治學，就把經濟倫理混在一起。羅斯金說：「細細碎碎地去研究社會，正如講究體育而假定身體沒有骨骼一樣的滑稽。」譬如：我們先把學生搏之成丸，圓之成餅，或展之成索，然後架以骨骼，這不是笑話嗎？素來研究社會科學的人，或則假定人類爲經濟的動物，或則假定人類爲社會的動物，或則

假定人類爲政治的動物，既各以其所假定者爲研究的對象，毋怪乎去事實之日遠也！所以本篇之作，固求於社會計劃，有所建議，亦社會科學混合研究之一嘗試也。

第二章 經濟現象的分析

我們要研究社會的經濟基礎，不得不先從分析經濟現象着手。經濟現象的元素，爲經濟欲望，也就是一個人對於各種物質的效用的欲望。譬如：他有求康健的趣向，他就要有康健所必需的物質效用。他有求智識的趣向，他又要有智識所必需的物質效用。他如求美觀，求社交，求家庭，求正義，求富財等趣向，亦無不各有其物質效用的條件。一個人對於這種物質的效用的欲望，就是經濟欲望。但是這種物質的效用，有不費勞力不費金錢而可以獲得者，那又是自由欲望而非經濟欲望了。經濟欲望有奢儉之分。其不顧本人對於社會的貢獻，以及物質供求的比量，但知逞個人一時之私慾，盡揮金如土之能事者，謂之奢侈的欲望。欲望的奢儉，對於社會是

很有關係的。

既有了經濟欲望，自必思所以滿足之，而生產之工作興焉。我們的欲望在效用，所以我們所要生產的，也是效用。效用分七種：物質本身之效用，物質之基本效用也。物質之由合式而起的效用，物質之形式效用也。物質之由應時而起的效用，物質之時間效用也。物質之由地位而起的效用，物質之地位效用也。物質之由宜人而起的效用，物質之對人效用也。他如物質之社會的效用，則視其社會價值之有無或大小而定。物質之調劑效用，則公用的物質之效用也。生產了以後，必定要等到實行消費，然後能夠滿足吾人的欲望。所以消費行爲，亦爲經濟現象之一種。生產有公私之別，消費有分合之殊，都是於社會很有關係的。

現代的經濟有四個特質：第一是競爭。第二是不均。第三是欺詐。第四是浪費。所以我們一看就可以知道現代的經濟，是很不圓滿的一個經濟。

競爭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。生產者與生產者之間，固互相剝奪，惟利是圖；消費

者與消費者之間，又互相競爭，惟私是謀。在表面上看起來，雖然有所謂公司者以爲生產者與生產者之聯合，但實際上，大股東與小股東有爭，優先股與普通股有爭，舊股東與新股東又有爭，貌合神離，其此之謂歟！而公司與公司間之競賣競買，形形色色，更何待言。在名義上，又有所謂勞資合作者，然而究其實，則主奴的觀念未除，仇敵的態度尙存，盈餘的分配未均，營業的管理獨佔，是則調協之未能，更何合作之可言！此外又有所謂各業聯合會者，初顧其名，固顯然公司間之合作團體也，而細思其義，則合作云云，又不過一擴大競爭，實行剝奪之工具而已。他如「托拉斯」「卡脫爾」等組織之性質，亦無不皆然，其內部固利益分歧，難免有爭權奪利之舉，而對外則無不以剝奪消費者爲最高目標，謂非競爭之尤者乎？至消費者與消費者之間，則富強者每處於優勝，而貧弱者每居於失敗。假定在米荒的時候，富翁甲欲購石米以備數日後之糧食，而寒士乙則今日即需此米，以維持生活，此時也，吾有以知甲之必以倍價誘購，而置乙之急需於不顧也！又如等候電車，弱者

雖久候且急，亦未必能上，強者雖無何要事，反每捷足先登，是亦消費者之間的競爭也！

競爭的起點，原已不均，所以競爭的結果，也就無平均可言。在現代的經濟社會裏面，差不多沒有一個地方不顯露不均的現象，這是很可以悲嘆的一件事！

他們在競爭之初，早就有財產智識以及地位上之不均。所以結果，除了少數特殊的情形以外，貧者愈覺其貧，而富者愈見其富，以貧富之懸殊較前益甚也。勞動之時間，雖已減短，勞動之報酬，雖已增加，而勞動者心理上之苦痛，反覺有增而無減，則以閑空與勞動之懸殊，較前更甚也。又如物價依供求而定，則當貨物求過於供之時，物價一律提高，而成本較輕者，獲利甚厚，成本較大者，或竟虧本，亦未可知，這個裏面，不就有不均的地方嗎？即如地價之增漲，吾人皆知其多因環境的改良而起，但是土地的所有權，本來沒有一定的根據，現在土地地位較優的人，不化勞力，而獲厚利，不又是一種不均嗎？再講到做勞工的人，在工時固報酬有限，

失業時復生活堪虞，較之經理及長官的收入與生活，不啻有天淵之別，勞心雖較勞力爲貴，然又何至相差如今日之甚耶？這又是不均之一。有此種種的不均，而能無影響於社會者，鮮矣！

現代經濟的第三個特質，就是欺詐。廣告術的精巧，賣貨員的口才，包裝法的講究，心理學的利用，無一不是欺詐的工具。廣告本負有商品教育的責任，然求之今日所見之廣告中，其能誠意介紹，不事誇獎者，百不得一也。賣貨員則負有指導顧客之責，然吾人今日所見之賣貨員中，不特泰半缺乏商品智識，沒有指導的資格，反每信口宣傳，意在誘惑。包裝方法，又多採「錦繡其外敗絮其中」之政策，而中其計者，比比皆是也。最後復利用心理學以發見顧客心理上之弱點，百般設計，以盡其欺詐之能事，而商業道德，遂不堪問聞矣！此外僱主與工人之間，公司與公司之間，亦莫不各守祕密，互相欺詐，經濟公開，蓋不足以語於此輩也。

最後還有一個特質，那就是浪費。現代經濟的浪費，大概有十個原因：第一，是

生產的沒有組織和預算。現在的生產者，大都各自爲理，不相爲謀，所以絕對沒有共同預算的可能，時而生產過剩，時而生產短少，過猶不及，同是浪費。而且既然沒有組織，則生產費用必大，此亦不經濟之處也。第二，是地方分工的沒有計劃。大概有許多地方，各因其地質地勢以及地位的關係，而有其生產的特長，如能分別盡量利用，其必有補於生產的經濟，又何待言。但是照現在的情形，或者因爲政治的分割，或者因爲眼界的狹小，大都缺少一種整個的生產計劃，以致產非所長，長非所產，則其不經濟又孰甚焉？第三，是生產標準的錯誤。現在有許多工業的出品，於經濟幸福，簡直完全沒有補益，大可禁止製造，以節資本，然而在私利資本主義的勢力下面，這却是不可能的一件事！第四，是天然富源的濫用。例如礦產是很有限的一種富源，森林是非經數十年以至百餘年不能利用的天產。但是現在已成的森林，固侵伐殆盡，而繼起的森林，又寥若晨星，正不知將何以爲繼也。至礦產之濫用，則以歐美各國爲甚。據派甘 Parker 的估計，美國在一八四五年所採煤礦，總

計爲二千七百七十萬噸，到了一九〇九年，其產額即增至四萬五千萬噸，相隔雖僅六十四年，而產額已增至十六倍以上。至美國每人平均煤礦消費，則據美國政府地質調查報告，自一八五〇年至一九〇七年，亦已增至二十倍以上。長此以往，則美國所有煤礦，將於西曆二〇五〇年用盡，距今僅有一百二十一年矣！假使別的國家，都有同樣的情形，不是很可怕嗎？第五，是發明能力的浪費。近年來的發明，很多關於戰爭的凶器。其性質固屬破壞，其結果又使人悲觀，這也是原因之一。第六，是消費的沒有組織。現在我們的消費，完全受個人主義的支配，抱爾爾我的態度，應該可以共同購買的東西，而分別購買之，應該可以共同享受的東西，而分別享受之，應該可以共同經營的東西，而分別經營之，這是很大的一種浪費。第七，是消費的沒有節制。消費者對於自己的欲望，固已缺少修養，無所遵循，而生產者對於消費者，又設計誘惑，以圖私利，而消費遂日趨於奢侈矣！第八，是資金的浪費。資金有效用漸增的法則，積於富者之手，則至相當程度以後，其效用即逐漸減

少；但若分配於窮人之手，則在相當程度以前，其效用能逐漸增加。現代的社會，有最大部份的資金，在最小部份的手中，這還不是浪費嗎？第九，是精神的浪費。天下本無事，而現在的人，或則鉤心鬪角，力圖剝奪，或又患得患失，卑鄙齷齪，或則垂頭喪氣，僅求生存，或又野心勃勃，狡焉思逞，凡此皆人類自取之咎也。第十，是時間的浪費。現在做工的人，有因生活感苦痛而效率低劣者，亦有因分配不得其平，而怠工罷工者，然則其不經濟為何如耶？而且，現在社會裏面的寄生分子很多。他們的時間是純粹的浪費。假使大家都做點必需的工作，不就很好了嗎？

概括的說，現代經濟的特質，第一為私利的自由競爭，第二為失平的財富分配，第三為欺詐的經濟關係，第四為奢侈的消費行為。此四者，考之今日的經濟社會，幾無往而不信然，宜其與一般社會有根本的影響也。

第三章 社會現象的分析

其次，我們還得把社會的現象，分析一下。一個社會的成立，至少有四個條件：第一，要有組織社會的分子，及各分子所必需的體格智力與氣質。第二，要有社會分子的組織。如家庭會社政府等，是也。假使沒有這種組織，則雖有羣衆而不成社會矣。第三，還要有社會的精神。譬如：一個人，假使僅有肉體，而沒有精神，則失其所以爲人，社會亦然。蓋必有相當之社會態度，社會公意，社會團結，以及遊戲、教育、習慣、道德、政治、法律、宗教、藝術、科學、文學、哲學等等，然後有真正的社會可言。但是社會固貴團結，而衝突亦所難免，所以衝突也是社會現象的一種。末了，還要有社會的革命，而後乃能使社會進步。革命並不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，無論那一種制度，行久了，就有缺點。假使我們達觀一點，勇敢一點，並能時以公益爲念，社會制度的革命，應該不是一件可怕的事，却應該是一件很有興趣的事情！

第四章 社會本體的經濟基礎

所謂社會本體，即指人口之數量，與一般的氣質智力體格而言。經濟生活對於這四點的關係，很大。大概經濟欲望比較複雜的人，其生殖的欲望必較小，而生殖的事實亦必較少。因為一個人，一定要有相當的智識，才有複雜的欲望。有了智識以後，他就知道他的經濟欲望，與他的生殖欲望，兩相衝突，遂不得不出於遲婚與生育之節制矣。譬如：美國的人民，大都結婚很遲，而生育甚稀，就是因為這個原故。中國的人民，有許多因為還沒有了解生活的意義，他們的經濟欲望，非常簡單，所以能產生大家庭的禮教，有大家庭的可能，而且能夠覺得大家庭的快樂。一到城市的居民，其態度就不盡相同，而知所以免避子女之繁多了。當然富翁裏面，不無急於為子孫結婚，以求五世同堂之榮者，國家裏面，亦頗多採取獎勵人口之政策者，然亦僅能見於人口過少，或財富過多之家國，與個人私利主義之時代也。或謂：在沒有共產主義的精神，而祇有共產主義的制度的地方，其人口之增加，必較前更速，亦以此耳！而且一個人的職業，也與生殖大有關係。譬如：在漁獵時代的人，

因爲居住沒有定所，人口的增加有限。到了畜牧時代，人口的生殖，就逐漸加速，及至農業時代，人口增加的速度，又視前更高，以人民之生活日益安定也。自工業革命以後，婦女或入廠工作，男子或日夜勞動；而且貧富之懸殊日甚，卽自立之能力日弱，結果生活之安定，遠不如前，而人口之增加，亦較前低落矣。中國到現在還是一個農國，則其人口之所以衆多，不就很容易明白嗎？

經濟與氣質的關係，亦至密切。氣質有剛柔之別。生活艱難的地方，其居民非至剛，則必甚柔，二者必趨其極。生活容易的地方，就不是這樣。大概卽不柔亦必不剛。因爲假使生活艱難的原故，在原料之絕對缺少，氣候之過分失宜，那當然容易使人氣餒。如果移居沃土，更易因優逸而成柔弱。此必然之理也。又假使生活艱難的原因，固亦在原料之缺乏，與氣候之失宜，而尙有可以勉強補救者，則急能生智，亦能生勇，閱歷稍久，氣質自剛矣。反之，假使生活非常容易，僅一舉手之勞，而卽可以飽食煖衣，則不柔已難，更何能剛？譬如 西洋人與中國人相比，西洋人

似較中國人爲剛，此無他，中國人之生活較爲容易也。但美國天產之富，不下於我國，又何以較我國人爲剛呢？那又不能不說是遺傳性的關係。所以生活難易的比較，蓋指昔而不指今，現在的美國人，比較宣告脫離英國的時候的美國人，似乎已經遜色了！而且機械發達的國家，其人民有人定勝天之概，故多剛。反之則柔。過去的中國人雖柔，而現在的中國人則已較前稍剛，將來或能視今更剛，亦經濟狀況使然也。

第三，就是經濟與智力的關係。經濟的發達與否，一面當然受智力及氣質的影響，而在他一面，亦能影響於智力。歐美各國近來科學的發明甚多，我相信至少有一部份是因爲他們大多數在機械中過生活的緣故。在許多發明的裏面，去發明一點東西，應該是不很難的一件事。但是中國人却尙不足以語此，這就是沒有機械工業做基礎的緣故。然而這並不是說經濟事業的發達，一定能夠促進智力。有的時候，其影響或僅能及於智力的方向。譬如：經商的人，對於私利的方法，無論其爲金錢的

，或非金錢的，都比較的要純熟許多，勞農勞工的營私能力就不及他們遠了。他如生活的難易，亦與智力甚有關係。一個人，假使因為生活關係，整天做工，沒有一點閑空的時間，對於智力的發育，當然是很不利益的。反之，假使飽食、煖衣、逸居，而一無所事，則其智力又必日益衰鈍矣。

最後，就是經濟與體格的關係。這也是很明白的。據最近專家研究的所得，大概貧窮的人，身裁較小，身重較輕，腦量較小，疾病較多，而死亡較速。但是有的時候，也許貧窮是結果，而體格反是原因。不過，比較的，以前面的關係，較為普通罷了。所以在經濟循環的裏面，經濟興旺，則生殖率提高，而死亡率減低；經濟衰落，則其影響亦必相反，蓋其定理一也。換一句話說，這就是生活與體格的關係。近來社會學家，對於貧民的生活，調查極多，普通，一個貧窮的人，其必生長於污穢的地方，固矣，而其居住的房屋，又每人口擁擠，光線既不講究，空氣又少流通，食物固欠充足，醫藥又每失時，精神上的娛樂，更無論已。這種生活，又怎麼能

夠不妨礙他的體格呢？這種關係，有一部份，也可以說是職業與體格的關係。因爲生活的狀況，每依職業爲轉移也。譬如：粵民的職業，大概都在鄉間，光線固甚明亮，空氣又極新鮮，人口既不稠密，勞動復有常度，無怪乎農民體格之多健全矣。勞工商民，就有大多數住在城市，其生活狀況，完全與農民相反，而體格亦遂不及。據美國公衆衛生調查報告，鄉村居民死亡之率，較諸城市爲低，良有以也。近年來城市方面，雖因醫藥發達，工廠改良，死亡之率，已漸減低，然而職業的影響，要未易完全消滅也。

第五章 社會組織的經濟基礎

聚若干人於一處，自必有其相當的組織，方能維繫於不弊，家庭、會社、政府三者，其主要者也。這三種組織的方式，影響於經濟者，極大。然其所受於經濟的影響，亦在在皆是。請分別申述之。

現在就先講家庭的經濟基礎。最初的家庭，從母系而不從父系，大概就因為做父親的，時常出去漁獵或交戰，所以做子女的，不但無從明白父母的關係，而且一妻多夫，或者也很難識別。自游牧時代以至農業時代，居住漸有定所，婚制亦已變更，或有從一妻多夫改爲一夫多妻制者，比較漁獵時期的情形，適得其反。而且當時家庭的分工，男子治漁獵游牧，而女子治家庭雜務，男子猶資本家，而女子猶勞働者，宜男子家庭威權之日振也。到了近代，家庭的威權，已由父系而改爲半父系，即婚姻制度，亦已由一夫多妻而改爲一夫一妻，甚且成一夫半妻之勢矣。所謂一夫半妻者，因離婚日益通常，結婚的意義，已不如往昔之嚴重也。這種父權的衰落，亦有其經濟的原因。第一，因爲到後來，法律上有承認婦女之財產的權利者，而婦女的地位，遂爲之提高。工業革命以後，機械發達，工作簡易，於是婦女亦入廠謀生，經濟漸能自立，此亦父權衰落與婚制變更之經濟的原因也。我們就拿中美的家庭爲例，這種關係的存在，亦至爲顯然。中國的婦女，就是到了現在，還是沒有幾

個能夠自立，所以女權女權之聲，雖不絕於耳，而真能以勝利者自居的，究竟極少。美國已嫁女子之有正當職業者，雖亦不多，但是在未嫁前，大都受過中等以上的教育，而且在學校官廳公司工廠等處，做過相當的事情，其能力可與男子相等，或且過之。那末，做男子的，當然不會再用歷史的觀念，去看輕他們，而婦女的權利，遂無待於爭，而自高矣，以上是關於父母的。他如兄弟妯娌間之爭鬥，亦多因財產而起。所以沒有遺產的兄弟姊妹，反而格外和睦，否則即令不至涉訟，亦必難免反目耳。

我在上面已經說過，現代經濟的特質，為競爭不均欺詐浪費四者。經濟與家庭的普通關係。已略如上述。其所受於這四種特質的影響，亦頗不小。家庭內之多競爭，正如整個的社會裏面一樣，因為對外既已用競爭的方法，獲得若干財產，到了家裏以後，也自然發生競爭的趨勝，此不特習慣使然，抑亦人情之常也。他們對於財產，既已養成相爭的習慣，與私利的觀念，於是對於父母的愛護，以及鄉黨的贊美

亦起相當的競爭，以求有助於其財產的爭奪，此無可諱言者也。家庭裏面，也有許多不公平的地方，這就是私利競爭的當然結果。譬如：有四個弟兄，士農工商各一，他們的天資，未必相差甚遠，而受過相當教育的，祇有做士的一個。這也許是因爲他生得清秀，能博得父母的歡喜，也許是因爲父母負擔能力的關係，均無一定的標準可言。這四弟兄既不免以私利相競爭，而競爭能力又大不相同，其結果之不能平均，不言可知。而兄弟妯娌間的欺詐，也就不可以倖免了。至於家庭的浪費，如煙酒奢華等類，也無非是浪費的環境所使然的呀！

第二種的社會組織，就是會社。現在的會社很多，有律師公會也，有醫師公會也，有會計師公會也，有學校聯合會也，有各校同學會也，有各處同鄉會也，有祕密之兄弟會也，有公開之學術會也，其餘類似的團體，尤屬不勝枚舉。而經濟的團體，如工業聯合會，商業聯合會，銀行業聯合會，以及勞工聯合會等等，尚不與焉。此等會社之社章，固莫不冠以聯絡感情，或研究學術之宗旨，然試一察其動機，則

又無不有其經濟的基礎在焉。

還有一種社會組織，就是政府。一國政治的體裁，每依經濟重心爲轉移。亞力斯多德說過：「社會有多少階級，政府就可以有多少方式，完全看那一個社會階級處於勝利的地位而定。大概不出乎少數專政與多數專政兩種，正如風之來自南北者爲最重要也。其由多數之平民貧民當權者，爲民主政治。其由少數之貴族及資本家當權者，爲寡人政治或專制政治。」經濟的階級，既每以財產之分配爲標準，而政治的體裁，又每以階級的消長爲轉移，所以財產的分配，也就能命定政治的體裁。證以各國政府的變遷，這真是一個不能更易的原則。大概一國政府，假使除了元首以外，還有一種人民的代表機關，那末，這種代表的支配，必多以財產爲標準。英國的國會，始於一二一五年英皇所賜與的憲約 *Magna Charta*。因爲這個憲約，曾規定以後非得議會許可，不得徵收額外的賦稅，則其不能無一議會可知。而議會於是乎成立。但是當時的議會，完全爲英皇直接的臣屬所組織。正式的議會，蓋至一

二九五年而後產生者也。其後國會的威權，日益增加，不但主有課稅的全權，而且指定稅收的用途，最後且成爲立法的機關，並進而左右閣員矣。蓋當時英政府因戰爭關係，需款孔急，既不得不用富有資產之人，以理財政，更不得不屈求議會，以增加軍餉也。英國中世紀的憲法，規定議會爲教士男爵地紳以及城市公民等所組織。教士與男爵入上議院，地紳與公民入下議院。然教士與男爵之入上院，非以其爲教士與男爵也，實以彼等皆貴族的大地主也。這個中世紀議會的經濟標準，從未嘗以個人平等的標準代之。到了一八三二年，因爲工商業的發達，遂不得不承認工商業者之加入議會。及至一八六七年，又加入了勞農的議員。最後復於一九一七年承認婦女的選舉資格。凡此，皆經濟勢力之消長，有以致之也。

法國在中世紀的議會，亦由教士貴族及平民三者組織。以法國之教士與貴族，亦皆大地主也。有謂法國當時教士所有之土地，占法國土地全部七分之一者，不亦駭人聽聞歟？到了革命以後，教會解散，特權取消，於是議會的組織，遂一改其舊觀

，亦財產分配之變遷，有以使之然也。

美國議院的組織，亦復以財產爲基礎。美國皮爾特教授 Charles Beard 在他的美國憲法之經濟基礎，說得很詳細。譬如：一七八〇年麥塞雀賽州所定之憲法，就規定非有年值三金鎊之不動產，或總值六十金鎊之動產，不得選舉議員。此外又規定非有價值一千金鎊之土地，不得被選爲州長。又規定各區當選上議院議員之定額，應以各區所付稅款之多少爲比例。紐約州一七七七年的憲法，亦認定財產之重要，故有非價值一百金鎊之土地者，不得選舉上議院議員及省長之規定。其對於下議院議員之選舉權，限制較寬，然而下級的勞工，亦不與焉。佛吉宜州一七七六年的憲法，亦以財產爲選舉權的條件。至於美國全國的憲法，雖未嘗有財產條件的規定，然其所以規定三權之分立者，不就是因爲要他們互相箝制，使緩急得以調劑，免致危及資產階級乎？其實，當時會議的時候，並沒有忘記財產的重要，但是有一個困難：就是假使規定動產的資格，則必爲農民所反對，假使規定不動產的資格，則又

非起草者之本意，所以就採用間接的限制，蓋不得已也。

德國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後所組織的議會，亦側重財產。德國的憲法，分所得稅與下院議員各三份。議員的三分之一，即由所得稅三分之一的付款人選舉之。其第二份的議員，即由第二份付稅人選舉之。其第三份的議員，則由其餘的許多公民選舉之。所以從前德國議會的兩院，其上院完全代表地主，其下院則代表資產階級者占三分之二，而代表無產階級者僅二分之一焉。最近德國革命以來，其議會的分子，雖仍以穩健派居多數，然憲法上已有經濟議會的規定，則又經濟重心之移轉所使然也。

俄國自從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，土地以國有為原則，產業以國營為主體。經濟的制度既改，政府的組織自異，俄國現行的蘇維埃制，不復以財產作標準，而改以職業為單位，良有以也。

以上是經濟對於政府的普通關係。而現代經濟的特質，其影響亦頗不小。試問現

代的政府，那一處不顯露競爭不均欺詐浪費的種種弱點呢？惟經濟手段之尙競爭也，所以議員長官之選舉，政府官吏之任用，均無往而不競爭。惟經濟權利之不均也，所以政府職務之支配，亦必以不均爲歸。惟經濟關係之重欺詐也，所以政府的行政，亦難免於欺詐。惟經濟行爲之多浪費也，所以政府的機關，每多駢枝而等虛設。事實俱在，毋待證據矣。

第六章 社會精神的經濟基礎

社會精神的要素。我已經在第三章裏分析過了。現在且再把他們所受於經濟的影響，來研究一下。一個人的社會態度，也有自卑的，也有自高的。有好新的，也有守舊的。有兼愛的，也有自私的。態度紛紛，不一而足。其所以然者，經濟生活之不同故也。所謂自卑的人，就是自己處處覺得不及他人，不但說話胆小，而且遇事畏縮。這種態度，多少有點經濟的原因，存在後面。大概在私利資本主義方興未艾

的地方，所有貧寒的人，多半有這種情形。反之，在社會資本主義進行順利的時候，一般地主富翁的態度，亦復如是。至於一個人的自大自高，亦每依其經濟生活與經濟潮流之相應與否而定。這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

一個人的好新或守舊，亦每受財產的影響。據最近社會學家的研究，(1)假定別的情形相同，則共產主義的思想，以在貧苦階級較易接受。資產較富者，多畏而避之。(2)假定別的情形相同，則社會的經濟組織愈複雜，或一般人民之生活愈困難，即此類思想的流行愈迅速。(3)假使社會的經濟組織簡單，或一般人民的經濟幸福有所增進，則此種思想不易得多數人之信仰。(4)假使社會的經濟，雖日形複雜，而平民的生活，却較前進步；或平民的生活較前退步，而經濟的組織較前簡單，則此種思想之流傳，順逆各得其半。(見 Sorokin: *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ies*)

還有，一個人的兼愛或自私，亦常有其財產的關係。貪財的人，雖多財而不肯濟人以財，即或濟人，而其目的仍在斂財。這種人，不但不肯濟人以財，而且無論對

於別人發生任何關係。沒有一個時候，也沒有一個地方，不存自私的觀念，不用傾軋剝奪的手段。至於廉潔的人，雖未必兼愛，而兼愛的人，却往往廉潔。因為假使他果然愛錢，兼愛就要發生困難，即陽貨所謂：「爲富不仁，爲仁不富」者是也。但此僅就真誠兼愛者而言。社會上固不乏借兼愛之名，而實行侵略者，自不可以一概論也。以上都是關於經濟與態度的。

其次，就是經濟與社會公意 The Group Mind 的關係。這種公意的有無，雖然還沒有定論。但是在我個人看起來，大概是有的。這種公意，並非各個單獨意志的總和，而爲各個單獨意志的較量積數。譬如：日本貨的抵制，在一般奸商，雖然很不願意，但是中國國民的全體，彷彿另外有一個公共的意志，——就是要抵制日貨堅持到底。彼奸商無敢公然反抗之者。又如勞工的罷工，未必個個人都很願意，但是勞工的全體，又好像另外有一個公共的意志，以爲非罷工不可。彼反對者，亦無可如之何也。這就是我所謂社會公意的意義。社會公意的產生，端賴社會分子之多接

觸 Contract，而商業的發達，企業的擴充，交通的普及，印刷的發達，所得的充足，皆所以增加各分子之接觸。然則經濟之有影響於社會公意，不綦大哉？

第三，就是講社會的團結 Social Solidarity。社會分子之能否團結一氣，抑竟如散沙一盤，其原因固然很多，而經濟的現象，要必爲主因之一。人類自從經濟界分業分工以來，農礦工商，各異其業，而相交易。一業之中，又各有專司，共同分配。在這種生產制度之下，很容易發生經濟的階級。所以從整個的社會來說，第一容易使社會的各部，有休戚相關之感。從部份的社會來說，更容易使他們有階級的自覺與自決。雖然現在各階級間的爭鬥，不免爲社會團結的障礙，但是到了危急的時候，現代社會的團結，却較前爲甚。譬如在歐戰的時候，平時善談世界大同的工黨，固多改其對戰爭之常態，而平時痛恨工黨的資本家，亦多改其對勞工的待遇，此無他，爲維持彼此連帶之經濟生活，不得不然也。而且貨幣的發明，電報的建築，印刷的進步，以及水陸交通的設備，無不有補於社會的團結，亦經濟基礎之一部也。

一個社會的精神，也可以從他遊戲的種類和性質去觀察。現在一般人的遊戲，所受於經濟的影響很大，遊戲場所，幾於非錢無以插足，以致遊戲之機會減少，一也。遊戲場所，各以營利爲目的，故遊戲種類，非有害風化，卽侮辱人格，與正當遊戲之目的，適得其反，二也。家庭遊戲，首重賭博，三也。遊戲營業，競爭劇烈，四也。而且這種反社會性的遊戲愈多，卽正當的遊戲愈少，其有礙於社會精神的發揚，蓋至大也。

講到教育，那所受於經濟的影響，就更大了！先從學校方面來說，現在有許多私立學校，因爲有許多校董是資本家，所以學校的教育，也就以迎合資本家的心理者，爲限。在中國固不乏其例，而以在美國爲尤甚。美國的州立大學，也有董事會之設立，其中亦不乏身爲資本家或與資本家同流合污者。故學校教育，每受同樣的束縛。這種影響很不利於社會的精神的。我記得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，就聽到有拒絕

尼令氏 *Scott Nearing* 來校講演的故事。尼令氏雖接近共產，但其所言每多獨到之

處。即使他果來演講共產，亦復何礙？因為假使沒有人來講解共產的真義，我們即欲批評共產，打倒共產，也就沒有根據了。但是教育不是限於學校的，現在的經濟社會——尤其是商界——對於一般人的觀念、態度、智識，就有一個很深切的關係。差不多個個人都被他們商業化了！因此在比較的高級學府裏面，商科的學生大都很多，而研究經濟學者，又以對於私利競爭的經濟學，為最有興味。而在這種環境裏面，教授經濟的人，又深信資本家對於社會的經濟建設，確有莫大的貢獻，大有「能者行之，不能者言之。」之慨（*Those who can, do; those who can't, teach*）。皆求步資本家之後塵，而恐不得。因此整個的教育制度，就完全在經濟壓迫的下面了！還有一種教育的機關，就是出版家。一般的出版家，本人就是資本家，所以凡不利於資產階級的思想，無不嚴加防止，以免危及本身，宜思想之不能自由矣！但是經濟與教育間最顯明的關係，却在教育經費。政府沒有經費，當然辦不成公立學校。私人沒有經費，亦辦不成私立學校。個人沒有經費，更讀不成書。所以

大概國家愈富，則其人民求學之機會愈多。個人愈富，則個人求學之機會愈多。但是這亦不過是一個常例罷了。當然亦有例外。而且有許多富家的子弟，其求學之機會雖多，而偏不求學。雖其原因仍在經濟界之種種誘惑，然亦在前例之外者也。統計學家恩及爾 Engel 定有一個家庭消費的法則，以為當一家收入增加的時候，(1)食物消費的比例，每見減少，(2)衣服費用的比例，無甚變動，(3)房租燃料以及燈光等費用的比例，一概如常，而(4)教育衛生消遣等費用，則每見增加，這也是照常例講的。

我們的習慣，也常常受到經濟的影響。習慣分個人習慣與社會習慣兩種。社會習慣，即普通所謂風俗者是也。杜威博士在他的 *Human Nature and Conduct* pp.60—70 裏說：「習慣不一定是守舊的。因為習慣與思想不一定是分離的。假使我們養成一種思想的習慣，那不就是維新的工具嗎？有許多人以為習慣與思想是不能相容的，所以做事的，一直照陳舊的法子做去，思想的，一直向奧妙的地方想去，而世界

的進化，遂出於偶然，而不出於思想矣！但是一般實行家的思想與習慣，却頗能一致，因為他們的思想與行事，既均以本人之私利為主，自無往而不一致也。他們有制裁環境的力量，一面獎勵一般人做例行公事的習慣，一面又資助離事實甚遠的那種學術。這種，他們叫作維持理想的標準。對於威權壓迫的忍受，他們就美其名曰團體精神，忠誠、專一、服從、勤勞、法律、秩序。但是他們自己，却又不守法律，而每思穿鑿附會，以求有利於己。因為在他們看起來，法律就是現狀。能維現狀，就是能夠遵守法律。他們對於別人的自主或自私的思想，雖每認為反常感眾的事情，而他們自己的思想，却又無時無刻不為自己。這就是所謂實行家的把戲呀！

我們看了杜威的話，就可以知道有許多人的習慣，都是這般實行家所造成的。而一般人之所以養成那些習慣，也無非是因為生活問題罷了！我相信有許多政府的長官，以及學校的當局，也很有同實行家類似的態度和方法，不也是因為生活問題嗎？此外我們還有許多習慣風俗，也有其經濟的基礎，譬如：結婚的儀式，無論是新

是舊，都還免不了賣買的色彩。送金鋼鑽的戒指與送聘金不是一樣嗎？還有通俗的「禮尚往來」，不就是賣買的變相嗎？他如祭祖之以冥洋，以及祈禱之求發財，又何一不以經濟為基礎？甚矣，經濟入人之深也！

至於道德的標準，亦每依經濟的環境而變遷。道德本由衝突而起，而衝突以關於經濟者為多。所以道德的本身，就是經濟的。而道德的科學，也就應以完滿社會的經濟關係，為着力之處。此外皆餘事也。管子有云：「倉廩實而後知禮節，衣食足而後知榮辱。」孟子亦云：「無恆產，則放僻邪侈，無不為已。」誠至言也。

羅列雅 Achille Loria 在他的社會的經濟基礎裏，有幾句很中肯的話。他說：「現在的資本家，用兩種方法，以弭除勞工的反抗。他們一面引誘許多不生產的勞工，使他們歸附於資本家，又使許多勞工完全靠着他們生活。這種勞工，不必工作，而報酬甚大。所以本人當然都願意擁護現代的資本制度。而勞工階級的人數雖多，却已失去一部份的實力。最初，還不過是金錢的關係。到了後來，這種勞工，就完全

失去了他們自私自決的意志。不但以服從爲道德，以反抗爲罪孽，而且心理上亦怕於反動了。在另一方面，資本家又很明白壓迫之不可過甚，而且做了許多所謂仁義，所謂慈愛的事情，以收服勞工的野心，這就是資本家道德觀念的經濟基礎。」

講到道德的標準，可以說有絕對與相對的兩派。前者，主張用理想定一道德的標準，然後即以之爲人類一切行爲的規矩，亘古今而不能易，這就是絕對說。後者，則以爲人類的道德標準，應隨時代隨地方而變化。沒有一個標準，在事實上能應用於任何時代任何地方，而無不宜。這就是相對說。絕對說注重於動機與意志之若何，而相對說則注重於環境結果，以及所謂道德之是否能增加人類的快樂。在相對說的人看起來，道德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我們講道德，是因爲我們要使得每一個人能夠得到完全的滿意，以及個性的表現。換一句話說，就是要使得最多數的人，得到最多數的快樂。這兩種標準，我以爲都有一部份的真理。譬如：盜竊剝奪等行爲，無論古今，都絕對認爲不合道德。同盟罷工，以反抗剝奪，在資本家雖認爲違反道

德，然而此乃資本家之偏見，非道德標準有所變更也。盜竊財產，以打倒財虜，在盜竊者，雖認爲道德，然此乃盜竊者之誤解，亦非道德標準有所變更也。此外，如離婚、奴隸、忠君、戀愛、守節、殉葬，等事情，其所以有道德於前而不道德於後，或道德於後而不道德於前之別者，無他，亦出於一時代或一階級之偏見或誤解而已。於標準無與焉！這是絕對說裏面的真理。至於第二說的長處，則在其注重環境。約翰穆爾是功利派的健者。功利派是相對說的一種。他一面固然相信各個的私利行爲，必能互相調和，以促進全體的幸福；但是他承認，假使有一個社會制度，容許一個階級去侵略別個階級，以圖自肥，那末，在享受特殊利益的階級看起來，這種不平等的制度，當然既公正而又道德了！但是在這種情形的下面，功利道德的理想，可就不能實現了！我們現在的資本制度，既以階級間之剝奪爲原則，也就不能實現這種道德。功利主義的道德，祇得行於平等之間的。所以財產制度不改良，相對說的道德，理論上就不能成立。至其及於絕對說的影響，則不在理論而在事實。

因為假使生活問題不先解決，雖有標準，亦復何益？事實上蓋無有遵行之者。孟子曰：「無恆產而有恆心者，惟士爲能。」然亦難乎其爲士矣！

經濟與法律的關係，也很不小。我們祇要稍微去查查各國的法律，就可以相信了。美國現在的憲法，因為注重在動產的利益，所以贊成通過的人，以商人及資本家爲多。關於這點，皮爾特教授在他的美國憲法的經濟基礎一書，說得很詳細，讀者可以參看。康姆斯 Commons 教授在他的資本主義的法律基礎三二九頁說：現在的政府，都依照公衆的目標，一再劃分其人民的行爲，或褒獎此，或貶抑此，務求於公衆的幸福，有所補益。但所謂公衆幸福與夫公衆目標的意義，則不特隨經濟文化的程度而異，亦視人與人的感情與習慣而定。他在三三三頁又說：美國憲法裏的“Due Process of Law”，在一千八百六十年之前，各法庭均解作“Due Proceeduse of Law”，但是一到近年，這四個字，竟至包含“Due Purpose of Law”的意義了！換一句話說，就是現在的法庭，在判決什麼案件的時候，不但須顧到法律的手續，而且須顧

到當事人的各方面有無違反一般社會所公認的規矩。現在美國的輿論，既以擁護資本主義爲重，則所謂“Due Purpose of Law”的解釋，當然亦以資本家的利益爲標準。而且法律本所以補道德之不足，資本家既然因爲要免除無產階級的反抗，就依靠私利心的指導定下了世俗的道德，當然不能再定一種法律，以補道德制裁力之不及。這是很明瞭的。但是法律固爲壓迫而設，仍不得不顧及生產。假使生產能力果因壓迫而頓形衰落，則於資本家亦至不利。所以現在有許多法律，於壓迫之中，又寓提倡生產之意。如勞工法、工廠法、社會保險法，等等，皆是也。我們再去看看法律上的賞罰，亦每以物質爲表示的方法，亦足證法律與經濟關係之密切也。

威廉姆斯在他的社會科學基礎裏說：「在近代理性的法律態度未產生以前，立法的目標，無不在處置資產階級間，或其內部，利益的衝突。自從民治昌明以來，司法與立法的人，固皆不得不顧全民意，但是階級的勢力，依然存在。法官的非科學態度，也沒有改去。因爲祇有這個主觀的態度，能夠適應他保護資產階級的心理」

。美國的法律哲學家勞特氏，也曾經說過：「現代的立法所受於特殊階級的影響甚深，我們假使一去披閱美國的律例，不能不相信，一個得勢的特殊階級，祇要他們不和某派的選舉人發生衝突，就很容易變更美國立法的性質和精神。」他以為假使法律能夠促進一國的文化，這種關係，決非消除不可。美國商人的態度，都是個人主義的，又就是迷信於人權之天賦的。而美國的法官，當他們做律師的時候，又多由巨商聘為常年法律顧問，所以就在那個時候，養成對於私產的偏見。於是到了解釋憲法的時候，就不由的成為資產階級的辯護者了。美國的法官，至少有兩個偏見，是袒護資本家的。第一個是對於勞工罷工之輕於禁制。第二個是言論自由的否認。美國人民的言論自由，曾於憲法第一次修改案明白規定，而且是絕對的。但是一般法官，對於這一點的解釋，却非常狹窄。尤其在歐戰以後，許多提倡社會主義的人，一概認為罪犯。當然其時有戰時法令可援。但是他們提倡的目的，並不在反抗法律；而提倡之後，又並未發生暴動，不過僅憑法官的推想，以為有危險的可能，

就把他們定下罪名罷了！

但是法庭的偏見，假使我們以為完全出於資本家的故意，也許太過了！因為法律本以關於財產權者為多。法律既認定財產有保護之必要，那末，有財產的階級，自然就是受保護的階級，而為法官所尊敬。所以祇要法官的態度，稍微守舊一點，就不免要有袒護資本的偏見了！

立法固然有上面所說的經濟基礎，而犯法亦復如是。據犯罪學家的調查，關於財產的罪案，以出於窮人者為多。即以區域而言，無論在都市或在鄉村，其區內的窮人愈多，則其罪案亦愈多。而尤以對於財產的罪案為甚。有的人，曾將麥價的漲落與罪案的增減，比較統計，其間也似乎有相當的關係。他如工業盛衰的循環，亦頗有影響於罪案的多少。大概工業興盛，則罪案減少，工業衰落，則罪案增加。或謂：財產罪案定有季節，冬季較多，而夏季較少。亦以氣候之有關於經濟也。（參考

少勞肯最近社會學說概論第十章）

至於宗教與政治的關係，斯賓塞以為尚武的國家，必趨向於專制，而工業的國家，則趨向於民治。因為從工業的機械，我們可以推想到宇宙的構造，以及因果的關係。而且科學的探究，又可以使我們免除迷信的觀念。從此歷史將不復注重於大戰的紀錄，與夫君主的言行，而趨重於科學發明，與夫思想進化的紀載，而政府的威權，勢必逐漸移轉於生產者之手。從壓迫下的平民，到創造中的自由；從強迫的合作，到自由的合作；從人民為國家，到國家為人民，皆工業發達之所賜也！所以工業愈發達，則政治愈平等。然而我以為還得看發展工業的方向如何。假使結果為資本家所壟斷，則在一般平民視之，又未見其自由平等矣。

哥特諾在他的立憲政府原理曾說：「英國人尊重實用。他們素來不注重於政府的體裁，但求事實上能保障他們所需要的權利或自由，於願已足。」這個裏面，就有經濟原因的存在。大概人們假使生活在一個很安定的環境裏面，而以農為業，就能安居樂業。沒有什麼可怕的事情，能夠使他絕對服從君主的指揮，輕易放棄營利的

自由。因此自由的愛護與奮鬥，就成爲他們公共的特性。即使他們的營業，一天一天地向工商業方面發展。而好自由的特性，却愈守愈堅，再接再厲。因此執政的人，也就不敢觸犯，趨向放任，而憲法的實質，已於不規定中規定之矣。所以人民的生活愈安定，大都皆專心一意於私利之營求者，則其對於固有的法律，愈尊重，每不願使其或更，致妨礙其私有的財產。而對於政體的名稱及其理論的基礎，則以爲無注意之必要。但是假使國家的基礎不穩固，時時有外侮之虞，日日有用兵之勢，則其人民對於私產的觀念較弱，對於政府的保護力量，希望較殷，而對於法律，反失其固有的尊重。所以人民的政治觀念，要看人民生活的安定與否，是亦經濟基礎之一端也。此外如政府組織，以及立法精神所受於經濟的影響，則已散見於前，毋庸重述矣。

但是既然講到政治的經濟基礎，就不能不提及外交的經濟基礎。普愛爾 Prof. 教授在他的國際關係裏說：「戰爭的原因，雖或起於好戰的天性，但是大多數的戰爭

，則每因經濟利益的衝突而發生。列強各國之所以不憚糜兵費背公理以克服弱小民族者，固以其有商業的價值，亦本國國民生活的需要，有以使之然也。全世界的貿易，差不多有五分之一是主國與屬國間的貿易。而且現在主屬國際間的貿易，比較自主國間的貿易，還增加得快些。在十九世紀的裏面，因為國外市場的擴充，歐洲商業所接觸的人民，比較從前，幾乎增至四倍。亦足見其商業的價值矣。」所以列強的外交，就是尼令氏所謂金錢的外交。這種外交的政策，我國人知之最熟。因為我們就是被犧牲的弱者，被試驗的材料，被蹂躪的商場，不得已而忍受之者，已數十年於茲，他們的鬼蜮伎倆，什麼都賞識過了！然而侵略的何止歐洲？受辱的又何止我國？美國之對於墨西哥、尼掛拉掛、菲律賓、聖得道明國，亦無不如此，或且過之，他們侵略的原因，都是經濟的。他們侵略的方法，都是剛柔兼施的。尼令氏在他美國的金錢外交那本書裏，把金錢外交分作七個步驟：第一為私人資本的輸出。其中受有本國政府之委託或特許者，亦頗不少。第二為對資本輸入國政府的要求。

第三爲長期租界，勢力範圍，以及種種特權的獲得。第四爲內政的干涉。第五爲軍力的示威逼迫。第六爲軍事行動的停止。第七爲弱小國家的買收或強迫統治。譬如：美國銀行家對於巴立維亞共和國的借款條約，就是不可使人卒讀的一篇經濟侵略的宣言。這個條約，訂於一九二二年的五月。其所規定的擔保品，有下面的幾種：

(一) 凡巴立維亞政府現在所有的巴立維亞國民銀行股票，均須移交監督機關保存

。巴政府現在所有的股票，已足以壟斷該銀行的政策。將來如遇該銀行增加股票，

巴政府猶須相當的增加其所有之股份。(二) 這種股票所分得的紅利。(三) 所加於採礦權的特稅。(四) 該政府所有火酒專賣的收入。(五) 該政府所有煙草專賣的收入

百分之九十。(六) 礦銀兩業以外的公司營業稅。(七) 銀行純粹所得稅。(八) 契稅。

(九) 礦業純利稅。(十) 進口稅全部。(十一) 出口稅全部。(十二) 凡此後爲巴士西塞

干鐵路 Potosi-Sucre Railroad 而指定的基金及各項稅收。(十三) 該銀行團對於從維

拉坐 Villazon 到鴨七斜 Atocha 以及從巴士西到塞干的兩條鐵路所有一切財產與收入

的優先押契。這兩條鐵路，假使在未滿期以前，由放款人買收，其由放款人所組織的鐵路公司，應以九十九年為營業期限。這個公司的營業與財產，政府不得課稅。

這個借款為數不過美金二千六百萬，限定分二十九年還清，而抵押品之繁苛，竟至如此，其用心之惡，能不令人髮指。然而還有別的條件在後，即巴政府在一九二四年以前，假使不得到該銀行團的許可，不得再借外債；即至一九二四年以後，亦必在新借款成立以前的兩年當中，凡為舊借款做擔保的收入，增加至一倍又半以上，而同時巴政府的經費，亦能應付裕如，方能有效。其顧慮之周，真可謂無以復加了！至於監察委員會的設立，更是一個必然的條件。後來幸而巴政府尚能如約照付，迄未發生政治糾葛。但是假使將來巴政府有不能使該銀團滿意的地方，其必引起美國外交的干涉，是沒有疑問的。

至於美國政府對於墨西哥的金錢外交，則其不近人情，更甚於是。在一九一〇年以前，美國對墨西哥的邦交，因為要經濟侵略而日益親密。但是到了一九一〇年以

後，兩國邦交，却又因經濟侵略，而日惡劣矣。墨西哥自從狹愛思總統受任以來，提倡實業，不遺餘力。但國富雖增，而民生日難，以其國富之所增者，僅在墨西哥的資本家，與留墨各洋商，於平民無與焉。所以後來墨國內部，就發生四個經濟利益相衝突的階級，即窮苦無告的平民，最新產生的實業領袖，貴族式的舊資本家，以及留墨的洋商等是也。一九一〇年的革命，殆即起於實業界之新領袖，麥特羅其人者也。

墨西哥的革命，要是事前沒有油礦的發現，也許不至於就會發生。但是在一九〇〇年，道漢納同許多美國的資本家，在海峽沿岸，買得油田甚多，而產額又非常豐富，獲利至厚。從此油礦遂成爲美國資本家在墨西哥之經濟侵略的目標。後來英國的貴族高特雷因事到墨，偶然對於油礦發生興趣，急圖染指。狹愛思總統與高氏素相友善，况爲抵制美國資本家之壟斷起見，更願利用高氏，以求兼利。然而美國資本家的反感，以及美政府的干涉，亦即從此始矣！所以在一九一〇年，麥特羅因反

抗狹愛思而革命的時候，美國的資本家實資助之。麥氏勝利以後，雖未嘗得墨民之悅服，然美國政府則承認之惟恐不及。塔夫脫總統且禁止墨國新政府之反動派在美國購辦各項軍械，亦足見其外交之方針矣。麥總統在位不久，又爲前總統之姪及中央總司令休歐塔等所推翻。休歐塔又是主張利用英銀團以抵制美銀團的。所以美國方面，自威爾遜總統接任以後，竭力反對休歐塔政府，不但始終不肯承認，而且盡其干涉內政之能事。此中經過，卑鄙齷齪，強詞奪理，蓋美國外交史上千古不能磨滅之污點也。當時墨國人民中，有克倫若者，方以立憲派之名義，與師討伐休歐塔，美國政府遂又以軍力助其成功，冀博得美國油礦資本家之一笑。但至一九一七年，墨國新憲法成立時，其第二十四條，却又聲明凡墨西哥之土地，無論其爲地面地層，一概屬之墨西哥之政府。以各國之憲法例之，此種規定，本屬尋常。但美國政府，又因私利攸關，認爲無異於沒收美國資本家在墨之經濟權利，繼續反對。後來墨政府欲以一種特稅加諸美國在墨的油礦公司，而美政府又不承認。若此藐視主

權，妨礙墨國之根本改造者，已十餘年於茲，即至今日，猶未已也。可憐世界的弱小民族，那一個不是如此！巴立維墨西哥不過隨便舉出兩個例罷了！

現在可以講經濟與宗教的關係了。勞列雅在他的書裏，講宗教的起源，在懦弱的心理。而心理上的懦弱無能，又起於資本家壓迫勞工的制度。資本家把勞工自立的基礎，既已剝奪乾淨，於是做勞工的，固不能進而奮鬥，又不能退而自守，而「天道原來如是」的觀念，遂油然而生，此即宗教觀念之經濟的基礎也。所以宗教能使人樂於守舊而怕於革新。資本家受賜之餘，遂不惜捐助重資，以事提倡，而尤以基督教之資本家為甚，其用心亦可謂苦矣！此外還有許多方面，可看到宗教的經濟關係。吾人每因事業失敗，經濟破產，而起信教之念，一也。有的宗教，因有鑒於奢侈之日甚，而以節制某種消費，如烟酒生畜等類，為信教之條件者，二也。各國經濟侵略，每以傳教徒為先鋒，而以帝國主義為後盾，三也。勞工生活的改良，經濟制度的理論，有完全根據聖經而創立所謂基督社會主義者，實則在以宗教勢力為現

代制度的保障，四也。所以宗教正與法律一樣，均所以補道德制裁力之不足。不過法律的力量，全在政府的執行，而宗教的力量，則在迷信於上帝之報應能力，此其不同之處也。

至於藝術的經濟基礎，我想可以分作音樂美術建築服裝等四項來講。藝術本來不限定這幾種，也有把文學與跳舞放在裏面的。服裝，普通都不認為藝術。然以近人對於式樣之注意衡之，或亦不妨以一種藝術視之。服裝式樣之所受於經濟的影響甚大。士農工商四民服裝之差異，職業與收入之不同有以致之也。城市鄉村居民服裝之差異，交通與廣告之不同有以致之也。他如男女之工作不相同，故服裝亦不相同。東西洋農產的種類以及工業的程度不相同，故服裝亦不相同。就拿衣服的長短與材料來講，大概工業愈發達，競爭愈劇烈，時間愈寶貴，則衣服愈趨於短，而多用呢毛的織物，如歐美各國的服裝是。中國人素來就是從容優遊，因循蹉跎，不知時間經濟之爲何的。所以穿的衣服，都做成長袖善舞，翩翩欲仙的樣子。實在是一種

工作效率的阻礙。很喜望有了經濟的覺悟以後，更有服裝的覺悟。假使以爲西裝的名稱不好，固不妨以中山裝代之也。至於衣服的材料，固與原料的出產有關，但是假使我們果欲努力工作，則絲綢決非最宜於外衣的材料。所以現在工商業較興的地方，棄絲綢的長袍而衣毛巾的短裝者，已日趨增加，殆即經濟生活所使然也。女子的服裝，亦每受經濟的影響，所以電影界的明星，遊戲場的舞女，街路上的妓女，均有其商業化的式樣，誠至有興味之社會現象也。

建築也是藝術的一種。其所受於經濟的影響亦大。譬如從前建築的藝術，偏重在皇宮與教堂的兩種；而近來則建築的藝術，幾已成爲經濟界的專利品矣。美術音樂兩者，亦復如是。此二者的功用，本所以陶冶氣質，表現情感，發揚個性。是最清高最幽雅的一種藝術。而今日的美術與音樂，則不然。蓋已盡爲營利心所驅使，由非賣品而變爲競賣品矣！托爾斯泰在他的什麼是藝術一書，對於現代的藝術，有下面的批評：「俄國政府爲維持藝術起見（一八九八年）曾以數百萬盧布，作爲補助

藝術學院存藝學校及戲院之用。法國規定以二千萬爲此項經費。英德各國，亦有此項津貼。每一個大城裏面，都有很宏大的藝術學院美術館存藝學校戲劇學校以及遊藝的場所，而且還有數十萬的勞工，如木匠泥水匠漆匠以及裁縫梳頭飾景掛紙訓練的人員，終其身的在裏面辦事，以滿足藝術的需要。所以除了軍事以外，世界上的工作，沒有比現代的藝術再會消磨人類的精神氣力了！這裏面，不但化了許多勞力，而且犧牲了許多人的生命。幾十萬的人，從小就在裏面，或者練習兩腿的疾動，或者練習指頭的飛奏，或者練習謔譜的抑揚純熟而又字字清晰。」托爾斯泰以爲藝術貴簡單而重自然，無怪其大不滿意於現代的藝術，而認爲粗俗。然而這就是現代經濟中的藝術呀！

至於科學的經濟基礎，當然更不必說。現代的科學，其受賜於經濟的地方，固然不少，但是最近科學的進步，亦不能謂非經濟之賜。譬如，試驗的器具，探險的旅行，製造的原料，科學的研究，等等，假使沒有資本，便無從下手，這是經濟基礎

的第一點。現代的科學，已經從爲科學而研究的科學，到了爲實用爲私利而研究的科學。近代科學的發明，多有以專利爲報酬者。這是經濟基礎的第二點。歐戰的時候，因爲經濟需要的逼迫，科學的發明不少，這是經濟基礎第三點。所以假定別的條件一樣，國家愈富，則其國之科學愈進步；競爭愈烈，則其科學之進步愈速。需要愈急，則其科學的發明愈多。然而假使別的條件不是一樣，那就未必如此了。

此外，還有經濟對於文學的影響。文學是人們情感、想像、思想、人格，的表現。其起源在於感覺。詩傳序有云：「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。感於物而動，性之欲也。夫既有欲矣，則不能無思。既有思矣，則不能無言。則言之所不能盡，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，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，而不能已焉。此詩之所以作也。」詩之所以作，卽文學之所以作也。

文學之起源既如是，則其不能免於經濟的影響，明矣。我國在唐堯的時候，人民的經濟生活非常安定，因有繫壤而歌者曰：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

田而食，帝力何有於我哉！」或又歌曰：「立我蒸民，莫匪爾極，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。」（見列子）這是社會經濟之形於民間文學的。

中國南北方的文學，亦每因生活情形的不同而異其氣味。這一點我們可以拿南北朝的文學來證明。向來南方的生活比北方的生活容易，其產業亦較興盛，所以其居民多柔弱而狡詐。北方人不種田而事畜牧，他們所衣食的東西，亦以出於牲畜者居多；就是他們的遊戲，亦以騎射爲主。所以北方的人多慷慨而直爽。因此南朝的文學，專講字面的工夫。排偶聲律，比什麼都看得重要。而北朝的文學則重在質素骨氣，這還不是經濟的關係嗎？至於個人的經濟狀況，亦很有關係。中國的唐詩，都說要算李杜的最好。但是他們的詩之所以好，完全因爲他們過的是平民生活，所以很自然又很動人了！還有做詩的人，常常說窮則愈工，也可以說是文學的經濟基礎。但是這一點恐怕祇限於做詩。至於別的文學作品，如劇本小說等類，則必遊歷名山大川以養其氣，考察中外社會以廣所見，博覽古今書籍以資考證，方有所謂活的

文學，有所謂創作的文學之可能。所以大富固然不是產生文學家的環境，而赤貧亦殊不宜於文學的進步。還有一點，就是經濟社會的盛衰與文學的性質，也很有關係。大概在經濟初興的時候，文學的作品，以樂觀的爲多；到了經濟恐慌發生以後，一定又會有悲觀的文學產生。歐洲在十九世紀的上半期，爲什麼產生許多悲觀的詩人如英之 Byron、法之 De Musset、德之 Heine、意之 Leopardi、俄之 Pushkin 及 Lermontov 呢？不就是因爲那正是歐洲多事，經濟凋敝，民不聊生的時候嗎？最近歐戰以後，歐美各國的文學，又趨於悲觀的批評，蓋因有感於中，不禁表而出之也。韓愈有言：「草木之無聲，風撓之鳴；水之無聲，風蕩之鳴，其躍也或激之，其趨也或梗之，其沸也或炙之；金石之無聲，或擊之鳴；人之於言也亦然。」所以文學是環境的產兒，而環境之中，又以經濟的關係爲大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

最後還有經濟對於哲學的影響。一個人的哲學思想，固然不一定爲經濟環境所限，但是也不能夠說完全沒有關係。就拿叔本華的哲學來講罷。他（一七八八——一

八六〇)的時候，正是歐洲最混亂的時候。法國革命於一七八九年，全歐思想爲之震動，但是不幸革命以後，拿破侖霸有法國，用兵黷武，力圖兼併，革命的理想，固同泡影，而全歐的人民，復飽嘗兵禍，英、德、奧、俄、意、瑞典，諸國，其受禍尤甚者也。所以當時的經濟狀況，實在慘得不堪。壯士之死於戰場者數百萬；農田之荒蕪失收者又數百萬；財富之收於人民而耗於軍事者，蓋不可以數計，其毀壞傷失於礮火中者，更無論已。此外如工人之失業，麥價之高漲，亦當時經濟苦痛發生之原因。英國雖幸而戰勝，而農民生計仍感大難，蓋其麥價雖不漲而大跌也。叔本華生長在這個環境裏面，且曾遊歷法奧等國，目睹其地之失望與悲慘的境象，無怪乎其哲學之悲觀，認世界爲意志，更由意志的自由競爭而終於破壞也！(看 *W. W. Hs: Outline of History* 及 *Durant: Story of Philosophy*) 斯賓塞 (1810——1903) 的政治哲學，以爲惟工商業發達的國家，纔能夠有平民的政治，和平的現象，恐怕也免不了經濟的影響。因爲那正是英國工商業方興未艾的時候。對外貿易既

在擴充，工廠法規亦已頒布，而且戰事勝利，其所受之經濟的損失，究不若他國之甚，宜其躊躇滿志也！然而還有一個別的原因，就是斯賓塞自幼失學，一直到四十歲，才知道讀書。所以他的態度和智識，完全得之經驗閱歷；而其經驗閱歷又大半在鐵路工程。所以他關於政始經濟所講的話，每與普通商人，若出一轍。其個人主義的思想，蓋不過將當時世俗的態度，加以理論的認定而已。進化論對於他思想的影響，比較的要小。而且當時社會主義的思潮，正在澎湃激盪，而未有已，斯賓塞的哲學，亦即所以抵抗其時經濟界之反動也。

社會精神之不能不受經濟的影響，已略如上述矣。是故經濟的現象愈惡，則其社會的精神亦愈惡，此必然之理也。我在前面已經說過，現代經濟的特質，以競爭剝奪欺詐浪費四者為最著。所以現代的社會精神，亦無往而不如此。試問政治、教育、藝術、遊藝、科學、文學、宗教、法律，各方面，有不表現其競爭剝奪欺詐浪費之特質者乎？無有也！經濟能促進社會之建設，亦能釀成社會的破壞；有心經濟者

，當知所以勉矣！

第七章 社會衝突的經濟基礎

社會固貴團結，而衝突迄未能免。社會上的衝突，有兩個主要的方式，即社會階級與國際戰爭是也。社會的階級，雖然不一定發生衝突，而其發生的可能，則無時無之，其已發生衝突者，亦頗不少。此其中蓋有經濟的原因在焉。勞資間所有的衝突，固必有其經濟的背景。就是別的階級，亦未嘗不然。

勞資之所以發生衝突，不就是因為雙方貧富的懸殊嗎？資本家因為私利的衝突，早就把工人所有的財產，剝奪淨盡，因此工人就完全失了自由的基礎，而投於資本家的陷阱，從此資本家遂得為所欲為，而勞工亦無可如之何矣。在上古財產混合的時代，凡是有相當的智力和體力的人，就可以謀他自己的生計，所以不但無所用其壓迫，抑且沒有壓迫的可能。到了後來，人口逐漸加多，欲望日益複雜，而私利的

野心以起，壓迫的手段乃行。最近機械發達，自必擴充範圍，方能盡量利用，於是剝奪的方法，更非積極進行不可。而且機械工作，婦孺老弱，皆能爲之，勞工數量，勢必過剩，遂又與資本家以一壓迫的機會。如此日積月累，而勞工的地位，遂不可收拾矣。現在勞工靠着結合的力量，聲勢已與前大異，然勞工之所以結合，又以經濟的動機爲其基礎也。

官民階級的產生，亦復如是。官本所以護民，但是因爲經濟的動機，現在的官吏，幾無一不以中飽自肥爲圖。捐稅罰金，不一而足，而尤以中國的官吏爲甚。那末，做人民的當然要對之如洪水猛獸，而不敢接近了。在做官長的人，既已剝奪人民，自然沒有面目去同人民親近。而且假使他們去同人民親近，就不能再有剝奪的機會了。所以現在官民間的關係，是一個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關係。甚矣。經濟之有影響於社會也！

城市的居民與鄉村的居民，也似乎各有其階級的觀念。這也不過是因爲經濟生活

的不同罷了。鄉村的人多樸實，而城市的人多浮華。鄉村的人多節儉，而城市的人多奢侈。鄉村的人多農作，多地主，而城市的人多工商，多資本。有此種種經濟上的不同，而雙方遂如冰炭之不能相入。其對於租稅銀行及國際貿易政策上之衝突，殆已屢見之矣。（參看美國經濟史）

至於男女階級的經濟基礎，則已於上文言之，不復贅述。

講到國際戰爭的經濟原因，更屬顯而易見。大概一個國家，到了私利資本主義最發達的時候，每難免於戰爭。因為生產方法，既日益進步，而生產組織，又日益集中，貨物的產額，幾可無限增加，但求其有利於資本家可矣！然而有兩個必要的條件，即原料與銷場是也。以世界之原料及銷場，與世界之資本家及資本家之欲望相比較，則前者至小，而後者無限，以至小之供給，滿無限之欲望，求其不出於爭得乎？所以到處的資本家，各挾其本國武力的外交，經濟的手段，以壟斷全世界弱小民族之原料與銷場，互相爭雄，各不退讓，結果乃不得不出於戰爭，以一決最後的

勝負。這就是資本主義到帝國主義，從帝國主義到武力解決，所必由的途徑。但是這種弱小民族，又正如魏伯倫 *Veblen* 在他的 *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* 裏所說的，決不肯甘於列強的侵略，而必思有以抵抗之。列強為強迫弱小民族起見，遂不得不有軍力的準備與示威，於必要時，又以一戰了之，此國際戰爭之又一經濟起因也。

第八章 社會革命的經濟基礎

上面已經講過社會衝突的經濟基礎，而內部衝突的極端，就是革命。照社會學家愛爾烏特 *Ellwood* 的解釋，社會革命的意義，是：「一個社會的歷史上面的一種非常的運動，其運動的結果，就是把該社會的政府，或其經濟與社會的制度，換過一個面目。這種運動，從裏面看起來，常常把社會制裁的重心，從一個社會階級，移到另外的一個社會階級；而心理方面，也就發生同樣的變遷，思想的潮流，以及

信仰感情等等，都移轉過來了。在表面上看起來，這種運動，往往引起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間的爭鬪，而入於一時的紛亂狀態。」還有一個法國的社會學者 *Michel Ralea* 以爲社會革命有三個要素：第一是一個團體。這個團體決不是整個的社會，而僅居社會之一部。這就是不滿於社會的現狀，而發起革命的一部。第二是一個理想的標準或計劃，以喚起社會的同情，並能於社會瓦解以後，從新結合社會者。第三是權力的移轉。假使祇有理想和同志，而沒有實力，決不能完成社會的革命。

世界的歷史裏面，這種社會的革命，已經有過多次，而最重要的，除了中國在一九一一年的革命以外，或者要算一六四二年的英國革命，一七七六年的美國革命，一七八九年與一八四八年的法國革命，以及一九〇五年與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了！

這七次的革命，沒有一次不出於經濟的要求。（參看尼令氏主編社會革命的法則）英國在十六世紀及十七世紀初葉的時候，經濟與社會兩方面的變遷很大。其交通

和生產的方法，都進步得非常之快。不幾何時，英國就從農業國而變爲商業國，復由商業國而變爲工業國了。因此其時社會上的舊勢力，和舊制度，處處成爲經濟發展的障礙，其自歸淘汰者固亦不少，但是還有許多皇室所特許的專利營業，大有礙於有限公司的擴充，幾成不能相容之勢，同時國外市場，却又日益擴大，而惟法荷西班牙之競爭是懼，所以決非將專利的制度，予以根本的剷除不可。而革命的基礎，亦卽在是。加之，賦稅繁重，物價大漲，勞工生活，日見其難，更覺革命之萬不容緩。這就是英國一六四二年至一六六〇年的革命的經濟基礎。

至於美國的革命，也完全出於經濟的要求。英國的國際貿易，從前限制很多。獎勵出口，而阻止進口，爲求金錢之內流，而免利權之外溢也。但是到了工業很盛的時候，英美兩國的巨商，誰都不願意受這些限制。所以美國的革命，可以說就是反對限制貿易的革命。然而尚有更近的經濟原因在焉。英國在一七六三年戰勝了加拿大以後，商業上固又多一海外的市場，而公債則爲之大增，政府的信用亦已不及從

前，蓋非增加稅收以作擔保，將無以復得資本家之資助矣。所以當時最大的需要，就是加稅。但是資本家和地主是不肯加稅的。所以加稅的惟一方法，又在強迫加諸美國的人民；而宣告獨立遂爲事實所必不能免矣。

法國一七八九年的革命，也有許多經濟的原因。自十七世紀以來，法國的政府，時時同商人地主以及農民等發生衝突。既沒有全國一致的度量衡制度，又沒有一個公平分配的租稅制度，他如工資房屋等類，也差不多沒有一處是公平的。有的省分裏面，一個平常的勞工，差不多要拿他工資的三分之一，納諸法皇；三分之一，納諸地主；自己所淨存的，不過收入的十二分之一罷了！假使農民所種的是他自己的田，他要以總所得的二分之一至五分之四，納諸法皇，自己就沒有什麼純益可說；農民遂多棄其田而他徙矣！法皇路易十四又未嘗注意於商業的獎勵。所以法國海外貿易的機會雖好，而終於沒有利用。而且各省內部的租稅，以及各省間的關稅，又極繁重不堪。再加以地主所課的通過稅，不但增加商人負擔，且有礙於交通。而土

地分配之不均，亦爲他處所未聞，蓋法國土地之半，竟爲法國人口百分之一所私有。此百分之一之人口，即貴族與教士是也。此外還有一個主要的經濟原因，就是法國的三次大戰。第一次，是對外的戰爭，其目的雖在擴張海上的勢力，而結果則法國的人口，十個有九個變成乞丐。這就是法國與英國之戰。第二次，爲耶穌教徒與天主教徒的內亂。結果有許多耶穌教的商人，都移殖國外，法國的損失不小。第三次，就是所謂七年的戰爭 *The Seven-years War, 1756—64*。結果法國在加拿大及印度所有的領土，損失甚多。等到這三個戰爭完了，法國的財政，固已破產，而一般物價的高漲，人民生活的困難，以及政府威信的喪失，尤足使革命危機有一觸即發之勢。法國第一次革命的背景，要不外此。

至一八四八年之法國革命，則其起因在法國之工業革命。十九世紀之初，正是法國工業革命的時候，自於一八二五年英國政府將其機械輸出的禁令取消以後，法國的工業，更見其蒸蒸日上而未有已。工作集中於工廠，人民集中於城市，勞工亦已

有組織，且曾提出增加工資與減少工作時間的要求。因此實業的領袖，遂覺有參加政治的必要。而當時政治上最有勢力的階級，却祇有所謂金融的貴族，如銀行家、捐客、以及鐵路、礦產、森林、的所有者，與一部份的地主而已。實業領袖之在國會者，為數極小。因此他們感受到許多不利益的地方，蓄志革命，已非一日。但是假使沒有英國一八四七年的金融恐慌，也許不至於觸發得那麼迅速。無如這次的金融恐慌，法國所受的影響很大，而尤以巴黎為尤甚。據巴斯脫格 *Bastiat* 在他的 *Revolutions, From 1789 to 1906* 裏面的紀載，法國當時所有的一百五十萬萬法郎，其中有二十五萬萬是現金，四萬萬是鈔票，其餘的一百二十萬萬都是匯票。到了恐慌發生的時候，完全等於廢紙。而失業的問題，復接踵而至，恰巧在恐慌發生的前兩年，穀類與蕃薯的收成，又極其荒歉。人民的生計，蓋已萬分困難。恩及爾氏謂一八四七年的金融恐慌，實即法國革命之起因，不亦宜歟？

上面這四次的革命，都是資本階級的革命。換一句說，就是新資本家為私利的衝

動，而向舊勢力奮鬥的一種革命。所以與俄國及中國的革命，雖同出於經濟的要求，而性質則完全不同。俄國的革命，是勞動階級的革命。中國的革命，是弱小民族的革命。請再分別申論之。

俄國在一八九〇年的時候，私利資本的主義，已粗具其規模。煤鐵的生產，從一八八七年到一九〇一年，增加至十倍以上。鐵路的建築，從一八九〇年到一八九七年，亦增加一倍。他如電車、電話、電燈、自來水、陰溝，等設備，在一九〇一年以前，在各大城市，亦已應有盡有。俄國在一八六七年，僅有大城十二，但是到了一八九七年，竟增至三十有七。城市的發展，就是工業發展的表示。所以俄國的資本家，已早露頭角，而勞工的階級觀念，亦已顯然。他們因為不滿意於工廠的生活，而無組織的罷工者，已非一次矣。俄國在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〇年之間，經濟恐慌發生，而經濟衰落隨之，因此失業罷工等騷動，遂成爲當然之現象。一九〇四年，對日宣戰，大敗而歸，不特國帑空虛，抑且信用掃地，而一九〇五年之革命，遂

於此命定矣。

俄國在日俄戰爭與世界大戰之間，雖力圖經濟元氣的恢復，但是滿途都是荆棘，卒不免於第二次的革命。其原因在他有許多工業的機械，和煤鐵等原料，均仰給於英德兩國，故自歐戰開始，宣告封鎖以後，即覺無以為繼。況且俄國之取給於德國的製造品固多，而其輸送於德國的原料，亦頗不少。到了歐戰開始，兩國貿易，完全中斷，即對於他國的貿易，亦為所阻止矣。

封鎖之影響於俄國之農業者，亦頗不小。在一九一五年的時候，各城的糧食，無不大起恐慌。狡詐者復施以投機的伎倆，而物價遂大漲。此外如燃料之短少，運輸之失調，尤為前此未有之現象。及至一九一六年之冬季，潑脫羅格蘭與莫斯科等地方，衣食住行等必需條件，均已成爲不能解決之問題。市民之日夜立候，欲求購一食物而不可得者，比比皆是。這種苦痛，勞工受之最深，而勞農次之。凡人苦則恨，恨則怨，而俄國人民，遂欲寢俄皇之皮而食其肉。所以俄國的革命，實俄人經濟

的苦痛趨使之焉。

最後還可以把我們自己的革命，來研究一下。中國在一九一一年的革命，可以說完全是因爲受了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，覺得外溢的利權太大；而各國的侵略，又都是政府外交失敗內政不修的結果，所以認爲非把滿清的政府打倒不可。這是很明瞭的。

列強對於中國經濟侵略的手段，分市場，投資地，及交通三種。綜我國一部外交史條約史以觀，實不外此市場與投資地之互相關係。我國之國際經濟現象，實可用此說明。所以列強對於中國的第一要求，就是商埠的開放。商埠開放了，各條約國復於各商埠實行其種種的特權，如治外法權，協定關稅，子口半稅，等是也。他們侵略的第二步，就是投資。投資分直接間接兩種。所謂直接投資，即指他們在我國所經營的鐵路礦產銀行工業而言；而間接投資，則指他們對中國各級政府或私人團體之借款而言。這種借款，不但以主要稅收爲擔保，且并收稅權而亦奪去，其野心

之大，蓋可想見。介乎這兩種方法之間的，就是交通權利的攫取。既以擴充商業的市場，復以保障投資的抵押，誠一舉而兩得者也。（參看漆樹芬著經濟侵略下之中國）中國人雖懦弱，但是看了他們這種軌外的行動，也少不了要奮然興起。而且中國雖然沒有大資本家，而小資本家則未始沒有。至於孜孜爲利，欲求爲資本家而恐不得的，更所在皆是。他們看了外人侵略中國的方法，頗思效而尤之，以侵略中國之同胞。所以在這般小資本家，除了國家觀念以外，還有私利上的衝突，更覺有排外的必要。而滿清政府，遂岌岌不可終日矣。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一一年，又正是全國水災，糧食爲患的時候。但是民間雖多苦痛，而政府方面，竟聞有身爲官吏，而壟斷米麥之市場，以利市百倍者，這也不能說與革命無關。至租稅之繁苛，以及用途之失當，固早爲人民所痛心疾首者矣。

第九章 新經濟與新社會

從上面看來，經濟之有影響於社會，既如此其大，而其影響之惡，又如是其甚，那末，改造社會，自然不得不從改造經濟下手。

所謂經濟改造，有下面的幾個條件：第一、吾人對於經濟幸福，應該有新的認識。自來人類對於經濟幸福的觀念，多以個人私產的多寡為標準。以為私產愈多，即其經濟的幸福愈大。因此，就養成貪多無厭的觀念與習慣。人人如此，而社會的幸福，遂不堪問矣！所以我們現在對於經濟幸福，應該有一種新的認識。換一句話說，我們都應該以社會的經濟幸福，為個人的經濟幸福。以心理的經濟幸福，代替物質的經濟幸福。行一不義，殺一不辜，雖得財產而不以為幸福。行一仁義，救一貧窮，雖損財產而仍以為幸福。視社會如藝術，視個人如藝匠，以社會的經濟問題為個人的經濟問題，庶幾得之矣。孔子曰：不患寡而患不均，均無貧。個人富而社會窮者，吾聞之矣；未聞有社會富而個人獨窮者也！

第二、吾人對於經濟欲望應該有理性的修養。必定要有完滿的社會，而後有健全

的個人；亦必有健全的個人，而後有完滿的社會。所以假使我們能夠不完全爲本性所驅使，而能受理性的指導，則凡欲望之有反社會的性質者，如奢華烟酒等類，自應設法節制。由節制而成習慣，由習慣而成自然。至其欲望之有社會性者，如對於智育體育美育德育所必有的物質的效用，則應設法獲得，盡量享受，以求成一健全的個人。庶幾經濟問題的根本原因，可以說已經解決了。從前談經濟哲學的人，如孔孟荀墨諸子，以及柏拉圖亞力斯多德羅斯金卡雷爾等哲學家，每於欲望修養，再三致意，良有以也。荀子在他禮論裏說：「禮，起於何也？曰：人生而有欲，欲而不得，則不能無求，求而無度量分界，則不能不爭，爭則亂，亂則窮。先王惡其亂也，故制禮義以分之，以養人之欲，給人之求，使欲必不窮乎物，物必不屈於欲，兩者相持而長。是禮之所起也。」所以一個通常的人，（就是不殘廢的人）其欲望應以其對於社會的工作爲標準，做幾分工作，有幾分欲望。欲望大者，必大其工作；工作小者，必小其欲望。否則，不勞而欲有所獲，吾未見其可也。

第三、爲生產行爲的合作。生產的合作，有三個條件。生產目標，應一致以消費者全體的利益爲前提，而不應以少數生產者的私利爲標準，一也。生產要素，應以公開的態度，共同經營，努力改進，而不應互相競爭，各守祕密，二也。但是我所謂生產要素的共同經營，並非各盡其能，各取所需，而毫無規則的一種辦法。其組織固須嚴密，其手段尤貴和平，至其範圍之大小，則視其生產之性質，定之可也。至於全國的生產，尤應共同預算，共同計劃，以免生產之過剩與不足，三也。爲欲達到上述目的，應即組織消費者合作社，量力從事於生產，四也。（參看世界書局出版拙著合作經濟學）一面，復發展公營資本，以補合作社之不及，五也。

第四、爲分配的整理。我們普通所稱爲交易的，實在不過是分配的一個間接的方法。所以到商店裏去買東西的人，應該就是生產工作中，享有分配權利的人。現在的商人，沒有明白交易之經濟的意義，所以不但不尊重顧客，且從而剝奪之，這是應該整理的第一點。現在的分配，均以供求爲標準，而不以工作的成本爲基礎，所

以有勞而不獲者，有不勞而獲者，這是應該整理的第二點。物價的漲落，與分配至有關係，應從統計及幣制各方面，力求其穩定。這是應該整理的第三點。人口的增加，假使沒有節制，即令生產方面如何進步，經濟制度如何改革，恐亦將無以應付。這是應該整理的第四點。

第五、為消費行爲的合作。消費固然有不便合作，不應合作，或不必合作的地方，但是我們現在的消費，似乎又過分的個人化；不但不近理性，而且成爲浪費。這也是應該整理的一點。譬如，我們的住屋，我們的膳食，我們的洗衣工作，我們的電話，汽車，以及我們的書報雜誌，都是大可以合作的。我在此地，又要提到消費者合作社了！假使消費者有相當的智識，去把他們組織起來，以共同經營他們的消費事業，不但可避免剝奪，以節省經費；而且可與衆欲樂，以陶冶性情，這不是很值得做的一件事嗎？

最後，我們還應該以科學家的態度，與夫科學的方法，去研究社會的經濟。要完

全沒有偏見。假使在事實上，私利制度，的確有許多弱點，我們就應該積極的去設法改革，不應該把個人的利害，夾在裏面。庶幾社會科學，得以日益自由，而不為經濟勢力所壓迫。過去之死的，整理的，描摹的，社會科學，今乃一變而為活的，批評的，創作的，社會科學了！自然科學既貴有所發明，社會科學何獨不然？所以我們對於社會科學的觀念，亦非加以根本的革新，不可。而尤以關於經濟制度的為最甚。我們不是要什麼新的主義，我們祇要一個肯合作，肯研究，好嘗試，好進化的，一個態度！

概括的說，舊的經濟，就是私利競爭的經濟。新的經濟，就是公利合作的經濟。惟人之各以私利相競爭也，故剝奪欺詐浪費等惡現象，遂為事實上所難免。經濟為生命的基礎；我們可以數日不聽音樂，而不能一日缺乏食物。我們可以數日不閱書報，而不能一日沒有衣服。人生的價值，雖不在個人之衣食；而個人的生命，則不能謂非人生價值的基礎。所以一個到了衣食缺乏，生命危險的時候，便免不了有放

僻邪侈的行爲。這是一種被動的私利行爲。至於做資本家的，他們雖然沒有實際的衣食問題，却有一種心理的衣食問題。他們要顧到自己將來的衣食，要顧到子孫將來的衣食，要顧到衣食之是否足以得社會的贊美，最後還要顧到衣食以外的財富之是否充足，因此，他們也就不能不用剝奪欺詐的方法，以滿足他們的欲望。即在經濟範圍以外，凡有可以間接達其目的之處，亦無不用其欺詐剝奪的手段。這是一種自動的，爲私利而私利的行爲。所以私利競爭的經濟，其結果必使社會完全無文化可言。至少，亦必使社會文化完全無價值可言。社會文化的程度，完全看社會分子對於社會的熱心與工作。而社會分子對於社會的熱心與工作，又須視其是否純粹，以定其高下。假使其熱心與工作之動機，在私利而不在社會，即不能認爲社會文化的表示。這是很顯明的。譬如，男女兩人，假使女子方面，僅以男子之富而與之結婚，在男子方面，又僅以自己之富，而娶該女，品學既不相當，而性情復不相合，則雖同坐最好的汽車，同住最好的房子，日日看戲，夜夜跳舞，亦未見其必有愛情

，誠恐床頭黃金盡，即不免於宣告離婚耳！返觀私利競爭的資本家，其對於社會的熱心與工作，又何嘗不然？諸凡教育、政治、法律、宗教，等種種工作，以及他們對於這種工作的熱心，無不以私人之利益爲動機。都不是純粹的。都不是有益於社會文化的工作。

所以我們要提高社會文化的程度，就應該提倡公利合作的經濟制度。假使大多數的人們，都能夠以社會的經濟幸福爲己任，都能夠修養他們的欲望，都能夠共同的生產，公平的分配，共同的消費，那就沒有什麼浪費。既不浪費，而又加以科學的研究，與夫生育的節制，吾有以知人類的經濟問題，將無待於競爭欺詐剝奪等手段，而自告解決也。經濟問題既已解決，則凡在社會上之種種建設，必能完全出於社會公益的至誠。惟如此而後社會乃有文化之可言，亦惟如此而後社會文化，乃有價值之可言耳！

第十章 結論

但是經濟改造，固足以改造社會，而非有大公無私，見義勇為，先知先覺的偉人，則仍無以言經濟之改造。所以根本還是一個心理建設的問題，還是一個人才與人格的問題。（參看新生命第一卷第十第十一兩號拙作資本主義之史的發展）

近來心理學家，發明人類行為，無一出於本能，而全以一束的習慣為基礎；而這一束的習慣，又不是一成不變的，乃是隨時隨地，依環境為轉移的一種東西。換一句話說，就是不能當「我」是一個無形無跡，脫離五官神經，而能單獨生存的東西。因為精神的自覺，完全以身體的自覺為基礎。喬鄧 D. S. Jordan 說：「我們除了從腦筋的細胞而發生的我覺以外，不知道有別的 *Ego*。無論什麼自覺，都是腦子裏各種原種分子互相合作的表現。但是腦子無非是細胞的積體，正如英國為其本國人民的積體一樣。所以我們假使說英國佔有什麼地方，或是英國志在做一件什麼事情，亦正如我們有的時候說「我要什麼」「我有什麼」一樣，都沒有正確的意義，不過是一種文字的便利罷了！所謂英國，就是指英國人民全體的集合而言。所謂「我」

，則指我身體內部的要素的協力而言。】（其見 Foot-notes to Evolution, P. 271——2）每個人的 ego。之所以能變成許多的形態，就因為這個緣故。

但是有的時候，各人又似乎有各人的意志，那是爲的什麼呢？這大概是因爲各人所處的環境，所受的刺激，不盡相同的緣故。刺激不同，所以應付的態度，也不同了。一個人，假使天天遇到同樣的問題，同樣的環境，他就曾養成一種特別的態度或意志。所以「我」是一個社會的產兒。必定要有好的社會，然後會有好的個人。然則這個好社會，又待誰去創造呢？我以為一定要有能夠自求變化氣質的人們，然後社會能有進步的希望。有這種能力的人，當然不會很多，因爲這是特出的哲人或異等的天才所有的事！

所以上面對於「我」的分析，僅能適用於一般的人們，以及每個人大部份的生活。但是每個人的思想裏面，都有些創造的可能。因爲每個人都有些傾向於變易與新奇。他有的時候能夠想到別人所沒有想過的事情，也會發覺他平日所絕對信仰的理

論的錯誤。這種創造性最濃厚的人，就是社會改造的前驅。要是沒有這種人，社會的進化，即使有一點可以說得，也祇能橫行而不能直上。韋廉姆斯在他的社會科學基礎頁三三二——三說：法律規定了私利的財產權，固然可以滿足許多的本能的衝動。但是人類同時也有幾種本能，是反抗這種規定的。譬如，在上古的時候，人類就有共食共產的習慣。到了現在，大家看了富者日富貧者日貧的現象，又表現出一種反抗侵佔的本能。他們以為富的人應該把財產拿出來，與貧的人分潤共沾，才是道理。這和反抗的本能，在現代立法上，已經有顯明的影響，如奢侈品的重稅，所得稅的累進。都可以說是他的象徵。然而這還是專指一般的人而言。在才智異等的人，其創造與反抗的本能，也當然特別有力，而他們促進社會進化的能力，也自然格外濃厚。卡雷爾 Carlyle說：「歷史上人類所有一切的成功，都是那傑出的偉人的成績。他們是人類的領袖，人類的驅使者，人類的印版，人類一切思想與作為的創造者。凡世界上所能見到的事業功績，都是這般偉人思想的結晶。這般偉人的歷

史，就是世界歷史的靈魂。無論什麼時代，祇要能夠尋到這樣的一個偉人，就沒有什麼危險。（見其 *Hero and Hero Worship, Lecture I*）詹姆士 Wm. James 也極言世界的進化，決不全以環境為轉移。斯賓塞之輩，以為惟環境能造英雄，而英雄決不能造環境，是詹姆士所極端反對的。持平的說起來，我們固然承認人類的行為，大都為環境激盪而成；但是人類固有能於同一環境之中，見人所未見，道人所未道，而為人所不敢為者。競爭經濟的改革，以及合作經濟的建設，完全看我們當中有沒有這種偉人呀！然而這種特殊的見識，非常的毅力，半固由於天資，半亦由於教育。假使我們能夠在這個私利競爭的壓力下面，勉強為思想的自由，留一線曙光，為傑出的人才，留一條生路，庶幾「新經濟與新社會」，就不是一個奢望了！

